

第十七輯

新疆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新疆人

.5

7

目 录

回忆沙里福汗窝阔台	穆哈西加肯(1)
在流亡动荡的年代	库尔班艾里· 乌斯帕诺夫(54)
富蕴起义的片断回忆	哈兹孜· 阿黑提(79)
马虎山军队对和田人民的暴行	买买提衣明· 托乎提(93)
被“遣送”阿勒泰的点滴回忆	哈力克· 沙克(101)
金树仁案内幕	濮清泉(106)

回忆沙里福汗窝阔台

穆哈西加肯

沙里福汗的出身及童年时代

沙里福汗窝阔台一九〇〇年秋诞生于现在的阿勒泰县克朗河畔，他的前四辈祖父窝阔台是阿勒泰哈萨克族中第一个去北京同当时的中央当局发生关系的人。一七九一年清朝的乾隆皇帝授于他镇国公的封号。

沙里福汗的父亲杰额斯汗后来接替了其父镇国公的职务。杰额斯汗的第二个孩子艾林获得郡王的头衔。

沙里福汗是杰额斯汗的二房太太莫提凯所生，他同艾林郡王是同父异母兄弟。

莫提凯太太出生于一般的中牧家庭，不属于贵族血统，因而没有能使沙里福汗按照当时的封建礼节受到贵族子弟所应受的特殊教育，只是让他在民众中受到了一般的教育。沙里福汗八岁时拜塔塔尔族的毕拉里艾孜来提毛拉为师，学会了读书识字，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打草、放牧、劈柴等家务劳动。这对他了解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影响。他长大成人之后，思路开阔，求知欲旺盛。但是，由于当时没有新型的哈文学校，他只能学习俄语或者是汉语，按照她母亲的

意愿是想让他从事牧业，发家致富。因此，她在他的求学道路上设置了一些障碍，但是这丝毫没有能动摇他求知的信念。于是，沙里福汗从一个名叫海尔丁的塔塔尔族知识分子那里开始了俄语学习。海尔丁毕业于俄罗斯乌法城的一所高等师范学校，沙里福汗在家里向他学习俄语，达到了能阅读和理解能力。

当时，沙里福汗有机会阅读苏联出版的一些报刊杂志。苏联在革命和建设方面的一些消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各民族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发展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就在这种启示之下，他为了熟练掌握俄语到了苏联，但是，不到一个月他就回来了。关于从苏联这么快就回来的原因，他向我们作了如下解释：

他是秘密越过国境到了离边境六十四公里处的斋桑城，他在那里遇到了十月革命时期逃到中国，后来又返回去的警察艾迪海木别克、夏亚合买提、萨哈巴等人，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并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们说：“我们暂时不向当局报告你来求学的消息，你装扮成山里来的人在我们家里住上几天，我们向熟知当局政策的人了解一下你的愿望能否实现，完了再给你出主意。”于是，在以后的二十几天内他没有同任何人接触，装扮成从山里来的远亲住在那些人家里。后来，他们劝导他说：我们已经向好几位朋友打听过了，你来求学是对的，但是，在这儿学习的后果可能不会太好，因为你出身贵族，你的祖先当过阿勒泰哈萨克人的王，中国的中央政权授予你祖父镇国公的职务，你的祖先实行了近二百年的封建统治。即便不谈过去，你现在的哥哥艾林继承了王位在实行统治。在苏联，象你这样出身于王公贵

族的人是没有地位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比如，布凯汗、阿不来汗、阿不里菲孜汗等人的后代，一个都没得到关照。因此，我们担心你也会象他们那样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劝你最好还是回去在家乡求学。”沙里福汗听从了他们的劝告，就回来了。

一九二二年，沙里福汗为了求学来到了迪化，并下榻于以前的熟人巴衣毛拉的家中。巴衣毛拉汉语水平很高，在当时政府的好几个部门从事翻译及其他一些工作。一九一一年，阿勒泰的孜克里亚拜斯代表阿勒泰的哈族和蒙族去参加大总统选举时，他充任翻译随同前去。他是一个颇有学问的聪明人。

沙里福汗向他说明了去苏联求学未成现在前来迪化学习汉语的愿望以后，巴衣毛拉十分高兴并表示诚挚欢迎。他随即带沙里福汗去拜见当时的新疆统治者杨增新，并向杨提出：“沙里福汗是阿勒泰哈萨克人的首领艾林郡王的弟弟，他为了学习汉语来到这里，希望能建立一个学校，以便让蒙、哈族子弟前来学习。”杨增新采纳了巴衣毛拉的意见，向教育厅长刘文龙下达指令，要立即组建一个学校。刘文龙根据指令，从当时的法政学堂腾出几间房子，开办了一所“蒙、哈学堂”，让沙里福汗充任自己的顾问，决定每月发给他八十两银子的薪金。沙里福汗便在这所蒙哈学堂里开始了汉语学习。

一九二三年三月，我也到了迪化，在沙里福汗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汉文。当时这个学堂只有一个班，后来，在沙里福汗的动员和号召下，从阿勒泰、伊犁、塔城、焉耆、迪化等地新增加了八十名蒙、哈学生。一年后，学校换了地

方，学生增多了，加上少数汉族学生，学生数量达到一百五十多人。学校一开始是四年制的小学，后来增加了两个高年级，成了高级小学。每年冬天放四十天假，阿勒泰的学生有时也回去度假。由于当时没有汽车，回去度假只能骑马，十三天才能到阿勒泰。

沙里福汗在近六十名蒙、哈学生中是很突出的。他经常兴致勃勃地从苏联驻迪化领事馆文化职员塔塔尔族的塔吉丁那里秘密借阅苏联出版的书籍和杂志。有些文章的重要片断他还讲述给我们听。他汉语脱盲之后，自费从上海、北京的“商务印书馆”邮购《东方杂志》、《观察》、《民族杂志》等进行阅读，并且把其中的一些文章，尤其是把世界及苏联出现的一些新的事件向同学们进行宣讲。他不满足于已学到的汉文知识，还利用休息时间自费向名叫夏巴拉的俄籍教师学习俄语，他的俄文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由此他可以看更多的俄文书籍，特别是更多的阅读从苏联领事馆秘密借来的有关马列主义常识的小册子了。这，一方面对他的政治水平的提高和革命世界观的确立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他在学生中的威信。

此时，新疆同内地并没有多大联系，由于交通运输只靠驼队，因而商运货物只限于兰州以西，最远到天津。杨增新常说：“内地越混乱，新疆就越平安。”实际上他把自己统治下的新疆视为独立王国，不想使人民的思想开化，他的统治是通过当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宗教上层及财主老爷们为后盾而实施的。沙里福汗目睹了这一切，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感到“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在学生中流露对当时独裁统治的不满情绪。

杨增新通过自己布置的耳目了解到沙里福汗的这些观点后，就想办法使他远离这个学校。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杨增新发布命令，任命沙里福汗为福海县知事，这是第一次让哈族人担任这样的职务。看起来，这是对哈萨克民族的莫大关怀，而实际上对沙来说是一次流放。因为福海县是一个交通十分闭塞的边远小县，县城里只有二十八户人家，该县管辖的六千户牧民终年跟随畜群游牧在外。沙里福汗并没因此事而停止自己的追求，他到阿勒泰专区的中心城市萨尔苏木别（承化，即现在的阿勒泰）从各方面探索反对独裁政权的路子，并广泛地同各阶层人士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

沙里福汗政治生涯的开始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考入了迪化一中，冬天收到沙里福汗的来信，他在信中说道：“放寒假时，你到吉木乃来一下。我现在已辞去福海知事职务回家来了，至于请你来的原因见面时再谈。”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了吉木乃，我们家所在的冬窝子离沙里福汗那里相距四十五公里。他来我们的牧地住了一星期（两年前他同我姐姐成亲），他对我说：

“你停止学业同我一起干吧，目前杨增新已死，金树仁上了台，他的独裁统治比杨还厉害，老百姓已无法忍受这残酷的压迫，他们还没有找到摆脱这种暴虐统治的途径。现在已经到了使民众觉醒，引导他们摆脱压迫，寻求自由生活的时候了。讲明白一点儿，就是阿勒泰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是直属中央管辖的特殊专区。那时，这里的人民每年向中央当局（北京）纳捐三百匹马。从一九一八年起，阿勒泰属迪化管

辖，它的特区的地位给取消了。杨增新、金树仁的独裁政权不给人民丝毫的权利，肆意实行掠夺性残暴统治。为了摆脱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开展活动，争取恢复阿勒泰原来那种地位。为达此目的，可采用这样几种办法：首先要取得阿勒泰现在的行政长官张鸣远的支持，他同金树仁有矛盾，因此他担心有朝一日会失去官职。此外，他也打算独自掌握阿勒泰的金矿资源，以便成为直属中央的特殊专区的长官。因此，他会支持我们，并会很容易地同我们合作。据我了解，阿勒泰人手中起码有一千多支较好的枪，十月革命后，从苏联逃来的白俄士兵把带来的大部份枪支卖给了群众，特别是一九二一年，逃犯巴奇赤带领几千人越过塔城边境来到阿勒泰时，他手下的士兵因饥饿用枪枝换了食品和衣物，但弹药较少。此外，我哥哥艾林郡王和哈那比亚贝子手中有杨增新给的六百支枪，其弹药也充足。但是，五响枪少，大部分是使用铅弹的九响及单响步枪，要弄到这批武器也不难。我在承化同哈那比亚贝子谈过了，如果我们一开始行动，他肯定会支持的。但是，我打听了一下哥哥的口气，他可能不会同意我们的行动，他胆子很小。我没有对他讲明，他的妻子哈德万是个危险人物，她一旦有所发觉，肯定会坚决反对，她掌握了我哥哥的所有权力。但是，只要我行动起来，她的问题也好解决。其次，我哥哥在牧民当中和在头目人及富裕牧民中间的声望及影响较大，因此一定要取得他们的支持。近一周内，我要带领同学扎里夫去承化，你随后带上曼坎及布尔津的买合木提到承化来，让他们协助我们工作。他们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有声望的人。”

我根据沙里福汗的安排，两周之后，带上曼坎和买合木

提到了承化。沙里福汗当时去了哈那比亚贝子的阿吾勒，我们也到了那里。那天晚上，沙里福汗就起义问题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哈那比亚贝子及其大儿子布哈提（因哈那比亚贝子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他的事务由大儿子布哈提管理）和小儿子吉代（他也是我们的同学）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沙里福汗用事实说明了民众所遭受的压迫以后又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摆脱金树仁政治压迫的唯一途径是举行起义，使阿勒泰重新直属中央。”他再次分析了实现起义的办法措施，还谈到了阿勒泰的行政长官张鸣远会支持起义。他还说：“一九一七年以前，阿勒泰是直属中央的特殊专区，我们现在的要求并不是分割祖国的统一，而是要直属中央管理，因此，中央肯定会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眼前的任务是摆脱金树仁的独裁统治，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举行反金树仁的武装起义。我们地势优越，不管金树仁调来多少军队也对付不了我们。现在除了张鸣远手下的六百士兵，还有一部分警卫的骑兵，吉木乃、哈巴河、布尔津和福海各有一连士兵，听说富蕴和青河马大人还有近三百名士兵。这些武装力量我们都有可能充分利用。因此，我们要抓紧现在的良机，趁热打铁。我现在的打算是，进城同张鸣远进行再次商谈，制定行动计划。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发表。”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同意。哈那比亚贝子说：“我真心实意地参加你们这次行动，要尽力协助你们，同时还要说服亲朋好友、部落头目人带领群众参加这次正义行动。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要派我的儿子吉代同你们一起进城，让他以我的名义同张鸣远交谈。”

第二天，我们在沙里福汗的带领下回到承化同张鸣远见

了面，把在哈那比亚贝子家里商谈的所有情况向他进行了汇报并向他说明了哈那比亚贝子的决心及派儿子吉代同我们前来的情况。张鸣远说：“你们在这儿住几天，同有关人士再交换一下意见，我们一起来制定行动计划。今晚你们就在我家作客。客人当中也有你们不认识的人，因此，席间不要谈这方面的事，咱们就喝茶吃席。”

晚上摆席之前，张鸣远把请来的宾客都一一作了介绍，其中我所记得的是：承化部队力量的长官及公署官员张参谋长，步兵长官刘营长、参谋长陈品修，骑兵队的朱大队长，承化的陈知事，商会的王会长，阿不都拉商总（回族），买买提商总（维族），日鑫隆老板陶经理，天津来的高经理等。席间除了吃喝和一般性的交谈之外，主要谈论的话题是今年阿勒泰托衣吐胡什，阿祖拜，杰额萨伊等地大量出金了，来淘金的人越来越多，物价上涨等等。席散了之后，随同我们来的其他人住了旅社，我和沙里福汗留在张鸣远家里同有关人员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参加筹划的人员有张参谋长、朱大队长、张鸣远的秘书王大忠，还有陈品修。经过多次商量，最后通过了以下两个文件：第一个是以民众的名义给中央政府的申诉，第二个是给阿勒泰各族人民的号召书。这两个文件的草稿是沙里福汗亲自起草的，据我的记忆，这两个文件的简要内容是这样的：给中央政府的申诉中写道：“阿勒泰有哈萨克、蒙古、汉、维吾尔、回、俄罗斯、塔塔尔等七个民族，他们长期以来居住在这遥远的边疆，一直和睦相处。在准噶尔贵族统治新疆的那个时期，阿勒泰人民忍受不了准噶尔人的压迫，迫不得已地沿着额尔齐斯河迁移，有一部份已迁移到西伯利亚河流域。阿勒泰人民至今把这称

为‘准噶尔暴乱和流亡生活’而代代相传说。准噶尔人的最后一个首领阿睦尔撒那洪台吉背叛祖国，勾结外国，反对中央，最后逃离新疆到了沙俄。在这期间，阿勒泰的民族英雄加尼别克巴图尔领导人民同沙俄侵略者作了不懈的斗争，带领人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阿勒泰。过了不久，一七九一年阿勒泰哈萨克人的首领窝阔台同中央取得联系，到北京同乾隆皇帝见了面，乾隆皇帝封他为镇国公，把阿勒泰定为直属中央的专区。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一七年，阿勒泰人民就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动，忠诚和睦地相处。阿勒泰的行政长官都由北京委派，一九一二年，北京举行首次大总统选举时，阿勒泰显贵孜克利亚贝子代表阿勒泰的蒙、哈民族到北京参加了总统选举。根据孜克利亚的要求，熟懂蒙、汉语言的巴衣毛拉随同他去北京，在怀仁堂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当了翻译。大会结束后，孜克利亚在北京停留了三个多月，把所有问题详细记录下来后才回到阿勒泰。阿勒泰人民主要从事牧业，在这个时期，阿勒泰人畜兴旺，呈现一派自由幸福的景象。一九一七年阿勒泰直隶中央的地位被取消，交由军阀杨增新管理，从此灾祸降临到阿勒泰人民头上，苛捐杂税日益增多，诸如土地税、牧业税，为官府衙门的官吏和士兵打草，运送粮食，柴火和饮水，为官吏们的商运事务服劳役，提供乘马和骆驼等等，捐税和劳役名目繁多。如果这些赋税和差事有一件没办成，轻者遭鞭打，重者被关押，甚至会悄悄地被处死。人民实在无法忍受了。我们先前是杨增新的奴隶，现在又成为金树仁的奴隶，我们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权利，我们所遭受的苦难是说不尽、写不完的。我们对政府的要求是恢复阿勒泰原来的特殊专区的地位，使人民从金树仁的压迫下获

得解放。阿勒泰现在的道尹都统张鸣远，无力使民众摆脱重压，金树仁安插到阿勒泰各部门的人员限制他的行动。张鸣远是爱民之士，我们要求中央在没派专人来阿之前，让张鸣远担任阿勒泰特殊专区的道尹和都统，如果我们的申诉不接受或得不到重视，我们将迫不得已地举行武装起义，推翻金树仁在阿勒泰的独裁统治，保卫自己的权利……。”

给阿勒泰各族人民的号召书的内容同给中央的申诉书的内容相同，但其中的措词和所举的一些事例更富于鼓动性，最后还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军阀金树仁的作威作福，推翻他的独裁统治，建立直属中央的地方人民政府。

会后，制定了如下的行动计划，

第一、给中央的申诉的原文是用哈文起草的，需要翻译成汉语，要求能代表各族人民的头目人和知名人士都在申诉上签名盖章。

给人民的号召书要用哈、蒙、汉三种文字起草并同给中央的申诉一起向有关人民进行宣读，这两个文件在行动日期确定后再发出。

第二、为保卫阿勒泰所属的七个县要组织二千一百人的武装力量，在都统府设立营务处，管理武装力量，它的日常事务由张参谋长负责，其助手视情况可由各民族抽一人担任，人数多一些的民族可多抽几名。

第三、武装力量的实际人数和其分配情况如下：刘营长手下的士兵要补足六百人，骑兵队人数增加到二百人。吉木乃、哈巴河、布尔津、福海等县各安排二百名士兵驻守原地。其官长若不称职，可另配合适人选。富蕴、青河马大人的三百士兵驻守这两个县，可派几人去协助，从哈那比亚贝

子那里抽一百名，从艾林王那里抽五十名，从吉木乃和哈巴河的汉族士兵中抽五十名，再从富蕴和青河的哈族中征兵一百名，由布哈提指挥并安排在富蕴和青河同马大人商量处事。从承化的俄族和蒙族中征兵二百名，其指挥另选。沙里福汗担任各民族士兵的总指挥，同张鸣远在一起商议办事。

蒙、哈族群众中武器不少，都要收集起来分发给各族士兵，弹药不足要想办法解决，骑兵队和刘营长的士兵武装完备之后大约还剩二百多支枪，这些枪可发给新征的士兵。

从维族和回族中新征的士兵暂时不单独组编，维族士兵安排到哈族士兵中，回族士兵安排到汉族士兵中。

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张鸣远召集所有的有关人员，向他们征求对两个文件和行动计划的意见后说，“如果大家没有其它意见，这两个文件拿去给哈那比亚贝子读一下，并让各部落头目人签名之后我们即可行动。行动进展情况要互相通报，同时大家要保持警觉。”张鸣远作完这些指示后，会议就结束了。

我们同沙里福汗来到哈那比亚贝子家里给他讲述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和宣读了两个文件。同时还商量采取以下行动：给中央的申诉抄写四份，给人民的号召书抄写数份由布哈提带往承化、福海、富蕴、青河四个县。由穆哈西带往布尔津、哈巴河、吉木乃三县，同有关人员见面，让他们签字盖章，并向可靠人士讲明来意，把群众手中的武器种类和弹药数量查清登记下来。同时还指定专人负责新征士兵的登记工作，使新征士兵处于戒备状态。

我根据身负的任务来到吉木乃同曼坎的父亲咯比里台吉见了面，向他说明了情况并让他在文件上盖了章，以后又来

到艾林王那里把所有情况向他进行了解释。他说：“我考虑一下，过四、五天你再来吧。沙里福汗不要幼稚地惹出乱子来。”他说完话没在文件上盖章。我对他说：“事情紧急，不能拖延，我再等一天，你同夫人商量一下，我们这件事阿勒泰的所有民众都支持，你若袖手旁观，对你今后的前途也不利，而且你要明白，这件事是由张鸣远都统亲自指挥的。”第二天他因怕遭到民众的不满和惹张都统生气，就不得已地在文件上盖了私章，但公署的章子没有盖。

吉木乃的事了结之后，我来到布尔津。本想带买合木提同去哈巴河，但在布尔津听到承化出了乱子，为了探听明白，就在布尔津待了三天。想不到沙里福汗带领扎里夫等十来个人也来到了布尔津。原来承化发生了这样的事：金树仁探悉沙里福汗和张鸣远在承化的活动后立即命令驻和什托洛盖的吴营长去承化接替刘营长的职务，并紧急命令张鸣远同刘营长去迪化，同时还派在迪化的魏镇国带二百骑兵去承化，他们通过阜康北面的沙漠火速赶到了承化。当时张参谋长到金矿征兵去了，沙里福汗到布哈提那里了解情况去了，张鸣远手下只剩骑兵队的近百名士兵，而且他毫无准备，因此没能进行武力对抗，他抱着外出的人会赶来支援的希望把交待工作的时间拖了三天，但希望落空了，便无可奈何地交出了所有权利并同意去迪化，哈那比亚贝子手中虽有三百士兵，但都分散在各家各户，没能集合起来采取行动。

沙里福汗讲完所遭受的挫折之后说道：“给金树仁传递情报的是哈那比亚贝子的参谋长陈品修，这个人要两面派，表面上支持我们，打听到所有情况后就秘密给金树仁传送了情报。我一开始就对他有所怀疑，并对张鸣远也谈过。但张

没有在乎，认为此人可以信赖。”沙里福汗接着又说：“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后，我秘密去见张鸣远同他商量对策，他说，‘准备工作没有跟上，事情延误了，金树仁召我去迪化，我不去不行，但他不会把我怎么样，迪化也有支持我的人，况且金对此事也不会刨根究底，因为他要追问我们同中央联系的事，对他自己也不利，如果这件事一公开从中央到新疆就会有很多人站出来支持我们，说不定金的乌纱帽也保不住。他是甘肃人，从其他省来的人当中就有许多人反对他，在官场中还有不少象我这样同他唱对台戏的人。因此金也希望这件事很快平息下去。另一方面他还怀疑此事同苏方有关系，他害怕一旦对阿勒泰的哈萨克头目人施加压力，他们就会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举行武装起义，后果不堪设想。况且我们在给中央的申诉中也明确提出了武装起义的事。金树仁担心一旦发生起义，外蒙科布多的哈萨克人也可能起来响应，因为他们同阿勒泰的哈萨克同属一个部落，都是阿巴克科列衣，互相都有亲戚关系，来往密切，因此金不会对阿勒泰的哈萨克头目人施加任何压力，你们要利用金的这个弱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准备你们的行动。另外，大家不要因这次的挫折而打退堂鼓，应该鼓起干劲，重新开始活动。目前的问题是要保守秘密，从这次挫折中吸取教训，放眼全省，随时了解各地的情况。眼下为了避嫌要尽量少接触人，保持安宁。”

没过多久，来了一个让沙里福汗去迪化“协助政府工作”的通知，由于催的急，沙感到不去不行，就对我说：

“我要是不去，金树仁就更加怀疑我，所以我还是去迪化为好。我到了那里以后，可以同了解全省情况并和有远见卓识的

人士接触，就我们起义之事及如何将我们的起义同全省的反金活动结合起来等问题向他们求教，这对我们今后的活动是有益处的。我到迪化后，金树仁肯定会把我监视起来，不让我返回。因此我想最好你同我一起去亲自看一下那里的情况。”我接受了他这个意见。

一九三〇年五月我们上路了，沙里福汗把家眷留在青木乃，让妹夫色衣提汗及其卫兵塔什毛拉陪同他前去。色衣提汗是一个沉着能干的小伙子，我们骑马走了十五天才到了迪化，事先知道这个消息的包尔汉、阿伊达尔赛热尼、巴衣毛拉等人以及许多熟人都来到黑山头迎候我们。

沙里福汗到了迪化后，金树仁接见他说：“过去你在迪化当过省府的顾问，现在我恢复你的原职，在处理有关蒙、哈族问题的事务时你就帮我出出主意。”他说完这些冠冕堂皇之词之后指示沙里福汗把家搬到迪化。这是金树仁不让沙离乌的一个圈套。

在迪化没过多久，沙里福汗就已了解到了全省各地发生的一些事情。当时在哈密和加尼牙孜阿吉领导农民发动了反对金树仁和哈密王夏买合苏提的武装暴动，对金树仁和夏买合苏提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阿勒泰的青河、富蘊哈族牧民忍受不了金的残酷压迫，为寻找和平、自由的生活一群群地往东搬迁，来到了巴里坤。他们看到当地的牧民遭受着更加惨重的压迫就把希望寄托在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继续向东迁移。

金树仁得知此事之后就委派原来给他传递情报的陈品修为东路指挥前去阻挡和镇压东迁的哈族牧民。

沙里福汗对全省发生的政治事件，尤其是对哈密维吾尔

农民的暴动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从中获得了经验。他对我说：“哈密农民暴动对我影响很大，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没有充分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只把希望寄托于少数上层人物和他们手中的武器，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哈密农民暴动给阿勒泰人民很大的启示，阿勒泰人民今后也会这么做的。最近从阿勒泰东迁的哈族牧民在通过哈密边境前往甘肃时同陈品修的士兵相遇，遭到了血腥镇压。我准备派一两个熟人去哈密了解一下当地人民的情况，尤其是了解一下哈密农民起义达到了什么程度，而后再派人去富蕴、青河打听消息。你们把买好的东西带回阿勒泰后，要利用做生意的机会同有关人士接触，把上述情况向他们做广泛的宣传，要让阿勒泰人民相信，哈密的今天就是阿勒泰的明天。至于以后的事情我们视情况商量解决。色衣提汗同你一起去把我的家眷带来，我身边也得有一个可靠的人，色衣提汗也答应同我在一起。若从邮局寄信不要牵涉政治内容，因为信件要检查，如有重要事情就通过派专人来联系。”

根据沙里福汗的指示，我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底回到了吉木乃。从迪化带回的商品我们分散在布尔津、哈巴河和吉木乃等开展活动的重点地方。我们以收购毛皮的商人身份开始了活动。我们向有关人士转达了沙里福汗的问候。到布哈提的阿吾勒同他见面后，他对我们说：“事情再不能拖延了，我们不能等待条件成熟，有些事情行动开始后也能补上去，你给沙大头（当时熟人都称沙里福汗为大头）捎个信儿，让他不要沉湎于迪化的享乐，想办法逃回来。他回来了，大家都听他的。我要对他讲的就是这些。”